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梁 容 若

日本所謂漢學，普通泛指我國的學術。有一個時期，和洋學（歐美學問，最初稱蘭學，主由荷蘭人輸入）國學（和學，即日本學）並列。後來也用以翻譯歐美人所謂“Sinology”也稱爲“支那學”。到現在，東京大學、廣島大學、高知大學等，還有支那學會的名字。有一個“中國四國支那學會”，就是廣島、愛媛、天理、香川、岡山各大學共同組織的。會址設在東京湯島聖堂（孔子廟）的中國學會，是日本研究中國哲學文學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的大同組合，出版有“中國學報”十多冊。山口大學、九州大學也有中國學會的組織。此外以研究東洋史（主要指中國史）爲中心的人士，組織有東方學會、東洋學會等社團，那是承襲了歐洲人的觀念，以中國爲遠東，把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文化國情的學問，稱爲東方學（Orientalology）。早稻田大學，組織有“東洋文學會”，實際所指是中國文學。東京教育大學出有“漢文學會會報”，東京日本大學出有“漢學研究”，福井大學也有“漢文學會”，可見傳統的漢學名稱，同時在流行。（註一）從較長遠較習慣的用語看，如“漢人”“漢字”“漢藥”之例，用漢學統指日本對我國學術文化的研究，並無不可。我所以不用“中國學”的名稱，因爲本篇重心是在學術方面，現代國勢調查一類情報工作，就是日本朝野「支那通」所作的業績，雖然和漢學研究，息息相關，我因爲沒有充分注意，就不免疏忽了。

一、戰後漢學研究大勢

在中日戰爭前後，日本人因爲經營大陸，中國語文學習，國情學術研究，一度成爲熱門學問。僑居過中國若干年，在中國完成了中學大學教育的青年，也有相當數目。敗戰以後，這些人相率歸國，利用他們已有的中國語文基礎，轉向於學術研究，是極容易有成就的。固有各大學的東洋史，中國哲文學系，因爲得到這些青年的支持，免於冷落。原有的漢學研究機構，也因爲得到生力軍而充實，其社會支持層轉趨雄厚。戰後公私立大學大量增加，據文部省全國大學一覽統計，一九六三年共有五百九十一所，（計大學 270，短期大學 32，國立大學 72，公立 34，私立 164，有研究所者 103），設有中國哲學文學語言歷史科目的，國立大學七十多所裏有六十所。有中國語文講座的就更多了。所以知名的漢學者，決沒有失業改業的，漢學書較戰前更有廣大的讀者層。通俗著作如吉川幸次郎、三好達治合編的“新唐詩選”（岩波書店版），據出版新聞社調查，一九五二年一年賣到十六萬冊，成爲全國暢銷書的一種。印滿精美圖版的圖解中國文化史大系（誠文堂新光社）、圖說東洋文化史大系、東洋美術史大系、東亞考古學大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新釋漢文大系（明治書院）、中國詩人選集（三十三卷，岩波書店版）、漢詩大系（全二十四卷，集英社版）、東洋文庫（東京平凡社）、中國書道全集（東京平凡社）、東洋陶磁全集（東京平凡社）等書的陸續出版，都可見漢學的普及化通俗化，成

爲一般國民的文化教養，決不僅是少數人抱殘守缺，玩弄古董的存在。看看“亞細亞歷史大事典”，“大漢和辭典”等規模宏偉的工具書，更可明瞭他們的紮實工夫，悠久努力。

據一九六一年的“日本中國學會會員錄”，共有會員六百六十三人，分析他們的職業，幾乎都是專門以上學校的漢學教師。另外研究中國史的人們，組織有東方學會、東洋學會，人數要比中國學會爲多。提倡重儒尊孔的學者，組織有斯文會，許多年以湯島聖堂爲活動中心，每年四月祭孔子，十一月祭先儒。據一九六一年會員錄有四百七十五人。和中國學會的會員頗多重複的。此外有中國研究所一派，多作現代中國情報調查等工作，和外務省情報人員，各自有其觀點與方法。估計專門研究中國學術國情，能著書譯書寫各種文章的，大約在二千人左右。漢學研究最重要的重心是東京大學，就是以前的東京帝國大學，地點在東京本鄉區。東京大學從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就設有古典講習科，承襲傳統漢學研究的系統，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改稱漢文科，是文史哲並包的。以後東洋史分出獨立（日本中等教育設東洋史科目始於一八九四年），考古語言等講座也陸續分立。前後領導學風的重要教授，哲文方面有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鹽谷溫、高田眞治、加藤常賢、倉石武四郎等。東洋史方面有白島庫吉、那珂通世、市村瓊次郎、箭內互、加藤繁、池內宏、和田清等。現任的教授，中國哲學有宇野精一、阿部吉雄，文學有小野忍、前野直彬、工藤篁，語言文字有藤堂明保，東洋史有榎一雄、周藤吉之、江上波夫，考古學有駒井和愛、關野雄。講座的數目實在寥寥可數，可是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庫擁有極豐富的圖書資料，另有其編制經費，事實上成爲東京大學的上層研究機構，教授研究生兼任交流，規模聲勢就壯大多了。東洋文化研究所，就是東方文化研究院東京研究所的後身，成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由服部宇之吉、瀧精一、仁井田陞等先後主持，現藏書達二十一萬冊，出版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已刊行至二十五冊。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註考證”，即由該所出版。遍佈全國的日本漢學者，大部分出身於東京大學。他們的學校刊物，“史學雜誌”創刊於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漢學會雜誌”創刊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另一個漢學中心是京都大學，京都大學的文科，創始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主要教授大部分是由東大聘去，或從東大出身。文學方面的名講座有過狩野直善、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哲學方面有過高瀨武次郎、武內義雄，東洋史方面有過藤田豐八、內藤虎次郎、桑原隲藏、小川琢治、羽田亨、那波利貞、考古學方面有過濱田耕作、梅原末治等。現任的教授，中國哲學有重澤俊郎、湯淺幸孫，文學方面有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平岡武夫、清水茂、田中謙二，東洋史方面有宮崎市定、田村實造、佐伯富、貝塚茂樹、森鹿三、岩村忍、藪內清、羽田明等，考古學方面有長廣敏雄、水野精一。京都大學附設有人文科學研究所，就是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的改名，自有編制和經費，擁有二十三萬冊的圖書，事實上也等於京都大學的漢學研究部。京大的“東洋史研究”季刊，創刊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五年），現仍在繼續發行。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室則出有“中國文學報”，已出有二十多冊，要算日本研究中國文學最充實的刊物。總合比較東大和京大的學風，大約東大較恢宏，較現實，努力於找新材料，迎接新風氣，政治氣氛始終濃厚，京大較紮實，研究深入而合作，看法比較長遠而超然。求真求是的意味爲多。

除了以上兩個漢學研究中心以外，東京的教育大學（以前的東京高師，東京文理科大學），仙台的東北大學、福岡的九州大學、廣島大學（以前的廣島高師）、東京的私立早稻田

大學、東洋大學、明治大學、國學院大學、大東文化學院，京都的龍谷大學，大谷大學，也都有悠久的漢學研究歷史，蒐羅保存可觀的典籍，聘請過不少著名講座，訓練過一部分漢學人才。近年來北海道大學、名古屋大學、神戶大學、大阪大學、大阪市立大學、橫濱市立大學、東京市立大學、東京法政大學、慶應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二松學舍大學、日本大學、一橋大學、京都同志社大學、福井大學、高知大學、山口大學、岡山大學、德島大學等處，都有關於中國學術的書刊出版，可見風起雲湧，新人輩出，機構叢生的一斑了。

戰前除了公私立大學的少數中國哲文，東洋史講座以外，用經濟力鼓勵支持中國學術研究的，以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所資助的滿鮮地理歷史研究調查為最重要，形成日本東洋史研究以滿蒙為中心的風氣。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起，外務省以中國庚子賠款的一部，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在東京京都上海北平分辦研究所、圖書館，蒐羅典籍，倡導漢學。得到幫助的實際上是很少數的專門學者，所印的書也不甚考慮銷路。戰後失掉了這種幫助，漢學者作書，不能不考慮市場。所以戰前的漢學者祝壽紀念論叢，如狩野直喜博士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西田直二郎編，1928年京都弘文堂刊），高瀨武次郎博士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1928年弘文堂刊）白島庫吉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池內宏編，1925年東京岩波書店刊）、內藤虎次郎博士頌壽紀念史學論叢（西田直二郎編，1926年京都弘文堂刊）內藤虎次郎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1926年京都弘文堂刊，收論文三十三篇，羽田亨編，內有王國維羅振玉傅增湘之作）桑原隲藏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31年東京弘文堂刊，收論文四十五篇）常盤大定博士還曆紀念佛教論叢（宮本正尊編，1933年東京弘文堂刊）小川琢治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論叢（石橋五郎主編，1930年京都弘文堂刊）服部宇之吉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高田眞治編，1936年東京富山房版）等論文集，豪華堂皇，內容都是專門文章，以限定的部數，分配於專業學者與固定學術機構，流入市場的並沒有多少。戰後所出的這一類的書，如“中華六十名家言行錄”（青木正兒博士還曆紀念集，1948年弘文堂刊）“中國之名著”（倉石武四郎博士還曆紀念集，1961年十月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編，東京勁草書房版，收文五十三篇，賴惟勤後記）“中國之思想家”（宇野哲人博士米壽即八十八歲紀念論集，1963年10月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編，東京勁草書房版，上下冊收文共六十四篇，阿部吉雄跋）這些書都是適應了一般讀者而寫的通俗文字，漢學是平凡化，而為大眾所共有了。青木正兒教授放棄了“明清戲曲史”“元人雜劇序說”一類的著書，改寫“中華名物考”，“酒中趣”，“中華茶書”，“琴棋書畫”，“中華飲酒詩選”等書，吉川幸次郎教授也停止了“尚書正義定本”，“元雜劇研究”的盛業，大寫“學事詩事”（隨筆集），“人間詩話”，“閒情賦”，“中國的古典與生活”，“漢文之話”，“新唐詩選”，“新唐詩選續編”一類書。連弄考古學的貝塚茂樹教授，也努力於寫“山莊旬日”等雜文了。近年來工商業發展，國際貿易隆盛，日本國民經濟大為改善，漢學專門書又有了市場，加以國內外的有力資助，形勢逐漸恢復到戰前狀態。看諸橋轍次博士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1953年10月東京大修館版）和田清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1961年東京講談社版）目加田誠博士還曆紀念中國學論集（1964年大安書店版）塚本善隆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1961年2月京都市刊）神田喜一郎博士還曆紀念書誌學論文集（1957年11月東京平凡社版，僅印五百部，有吉川幸次郎駢文序），都是比較專門的作品。諸橋轍次是東京教育大學的名譽教授，兼任靜嘉堂文庫庫長多年，是大漢和辭典的主編人，塚本善隆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長，現任國立京都博物館館長，是最博洽的佛教史學者，神田喜一郎作過臺北帝大教授，

大阪市立大學的法文部長，京都國立博物館長，是版本目錄的權威。目加田誠曾久任國立九州大學的文學部長，和研究宋明理學的楠本正繼是福岡漢學的中心人物。

日本的漢學，未因大戰而衰頹，成名的耆宿，多能老而不衰，領導風氣，表現出鍥而不捨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新人更為努力奮發，通俗專門，兼籌並顧。出版書刊更表現出空前的活潑盛況。最近吳瀛濤先生在“出版月刊”編了一篇「有關中國的日本新刊書目」，（註二）所收限於1961到1966，五年出版的書，已經有四百二十多種。雖然有的是舊書新刊，可是遺落的新出書也不少。平均一年要有八十到一百種新書出現。自然這其中是通俗的冊子居多。可是如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的津田左右吉博士（1873—1961），數十年竭全力於我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全集三十三冊（重要的有“論語與孔子思想”“周官之研究”“左傳之思想史的研究”“道家思想與其展開”“儒教之研究”“中國佛教之研究”等），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陸續由岩波書店印出。清水泰次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 1962 年出版，“羽田亨博士史學論文集”上下卷1957年出版，這些故人作品的整理重印，可見餘力的充沛，讀書界的深入要求了。

二、日本保有的中國文獻

宋朝歐陽修詠日本刀歌說：“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雖然並非事實，日本從隋唐和我國交通，有大量的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前來，帶回我國的文物典籍很多。他們因為遠涉重洋，得來非易，所以保存特別注意。宋元明清時代，商舶的來往逐年加多，輸入的典籍文獻也就更多。唐僖宗乾符二年（西元875）藤原佐世編“日本國現在書目”，（註三）可見晚唐時代傳入日本的書已是洋洋大觀，並且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不曾著錄，僅見於這個書目的佚書。德川時代，林述齋（天瀑山人）編“佚存叢書”，凡十七種一百十卷，刊行於嘉慶四年至十五年。光緒八年（1882）有上海黃氏翻印本。在這以前，梁皇侃的論語義疏，古文孝經孔氏傳，早由東瀛復歸。山井鼎著的“七經孟子考文”，所以著錄於四庫，為盧文弨、阮元等所看重，主要因多據日本古本之故。以後黎庶昌刊古逸叢書，張元濟印續古逸叢書，大收扶桑的珍本。楊文會通過日人南條文雄，求中土失傳的佛教經疏，得藏外典籍二三百種。上海頻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書院的小本大藏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的續藏經，孫楷第編“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六卷，（註四）都可見日本保有中國典籍之多。日本歷史上也經過許多戰亂，但因為佛寺神社皇室，常常立在兵火漩渦以外，所以保留了不少文獻。這次大戰，因為疏散得法，也因為美機的避免文物轟炸，因而保存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的寺院博物館得以完整無恙，東京的東京大學、神田文化街、湯島聖堂、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等，也幸而脫出了浩劫。所以大戰對於日本文物的損壞，實在止於最小限度。從漢學研究的觀點看，現在日本保有的中國文獻，值得特別說明的有以下各所：

1. 靜嘉堂文庫 現在算作日本國會圖書館分館之一，原是三菱財閥故岩崎彌之助男爵（卒1898）的私立文庫。取詩經大雅既醉篇“籩豆靜嘉”之意命名。靜嘉是清潔而美的意思。岩崎蒐羅中國典籍，先得殿版圖書集成、二十四史等，續得檜原陳政（俞樾弟子）所藏中國地方志多種。一九〇七年（清光緒33年）以十萬元收浙江歸安陸氏皕宋樓書，悠然東渡。陸心源為清末大藏書家，有皕宋樓藏宋元舊槧，十萬卷樓藏明後秘刻名人手校手鈔及近儒著述，守先閣藏尋常刻本及鈔本之無異者。（註五）岩崎既得其書，目錄學者島田翰為之整理，珍籍實數為北宋刊本7部80冊，南宋刊本114部2611冊，元刊本109部1999冊，先後印行有“靜嘉堂秘

籍志”五十卷（河田熊編，民國六年鉛印本二十五冊）“靜嘉堂宋本書影”（諸橋轍次編，1933年東京文求堂版）“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1930年鉛印本）。民國十三年（1924）改爲圖書館組織，復廣收日本及韓國古本並書畫等，建立鐵筋洋灰式館舍於岩崎氏祖塋附近紅葉岡。現擁有線裝書二十餘萬冊，日本漢學者得此秘笈，於校正原典，擷取史料，有無量方便。我國人到這裏看過書的，傅增湘、董康、張元濟、孫楷第等都可以在題名錄裏發見。中華學藝社也景印過它的珍本宋刊“冊府元龜”、“武經七書”等。現任庫長爲米山寅太郎。

2. 東洋文庫 從一九四八年（民國37年）起，這也成了日本國會圖書館分部之一。三菱財閥岩崎久彌男爵，於民國六年（1917），以英金三萬五千鎊，買去莫利遜的全部藏書，從北平運到東京，這就是東京本鄉駒込上富士前町東洋文庫的來源。莫利遜（G.E.Morrison 1852—1920）是英籍澳大利亞人，作過摩洛哥國王的侍醫，長時期是作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他徒步縱斷過澳洲，陸路由緬甸到上海北京，由北京經新疆到過俄屬土耳其斯坦。義和團變亂的時候，他在北平。日俄戰爭，日軍攻陷旅順，他跟着乃木希典將軍入城。樸茨茅斯和約的締結，他也在場。一九一九年以中國總統府顧問的身份，參與中國代表團，出席過巴黎和會。這個人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以後，他久住在北京，收集研究東亞問題的圖書雜誌，地圖照片，古今兼綜，細大不遺，逐漸成爲研究東亞問題各國文獻的總匯。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左右，莫利遜圖書館，已經有名於歐美研究東方學的學者羣裏。民國元年他辭掉泰晤士報通訊記者，就任我國政府顧問。參考書對於他不再需要，他想賣於我國，但是當時的政府和民間，沒有人肯出他滿意的價錢。美國人有意買，他以爲研究遠東的圖書，原則上應當保留在遠東，所以沒有同意。拖延到民國六年，日本財閥岩崎久彌，接受日本史學界敦勸，出資買去了。這時凡有書二萬四千冊，地圖畫片一千幅，包括英、法、德、俄、荷蘭、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麥、波蘭、匈牙利、希臘、芬蘭等各國人各種文字的著作，而研討的中心，却是中國。單是馬哥波羅的遊記，就有四十多種版本。此外如明末以後，歐西耶穌會士研究中國文物的報告論文，各國亞洲學會東方學會發行的學報刊物，以及各種可供參考的非賣品機密文書，應有盡有。莫利遜提出幾個附帶條件：一是圖書集中保存，西文仍用莫利遜文庫原名，以作紀念。二是照原計劃與範圍，繼續蒐集書刊。三是公開於世界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這些條件，岩崎都答應了，而且以後相當信守。莫利遜圖書遷運到東京後，漢名定爲東洋文庫，民國十二年正式開放，事實上成爲日本全國東洋史的研究圖書館，羽田亨、白鳥庫吉、石田幹之助、和田清等，都藉文庫以成學，也以全力協助文庫的發展充實。敦煌古文書的蒐集，中國地方志、族譜、家乘、搢紳錄、機關職員錄、同學錄等書的收集，尤其是洋洋大觀，極爲切實有用。經過世界第二次大戰，東京變爲火海，文庫的書並未遭劫。戰爭結束後，老外交家幣原喜重郎一度任館長，像是爲了圖書的安全。政府每年給以補助費。現在圖書超過五十萬冊，相當莫利遜當年蒐集的三十倍。比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圖書，也要多出一倍以上了。

東洋文庫常常舉辦東洋學術講演，開圖書展覽會，刊行“東洋文庫論叢”二十多種，各種目錄四十餘種。近年得到美國哈佛燕京社、羅氏基金團、亞洲協會、福特基金會的大量資助，業務更爲活躍，形成日本東方學研究，國際連絡中心。單就敦煌卷子說，它已具有倫敦、北平、日本所藏的全部照片，和巴黎所藏的一部分。現任庫長爲榎一雄，圖書部長岩井大慧已退休。（註六）

3.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日本以我國庚子賠款一部，設立文化事業委員會，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在東京、京都，分別辦研究所。京都研究所由狩野直喜博士主持，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正式成立，建築館舍，蒐羅典籍。以後松本文三郎、羽田亨繼續主持。一九三一年起，刊行東方學報。一九六四年出第三十六冊，為創所三十五年紀念論文集。另印行研究報告，梅原末治、塚本善隆、長廣敏雄、藪內清、木村英一、平岡武夫諸教授之專門著作，多由本所發行。所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附書人名通檢（1963年版）著錄詳審正確，分類細密，極便於檢查。所編“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由一九三四年起，逐年印行，亦為治中國學術者不可少之工具書。現所中藏書近二十三萬冊，各種目錄卡完備，應用極為便利。研究部現分日本、東方、西洋三部，然實際以東方部為中心。編制共有教授十二，副教授十四，為京都漢學的中心機構。先後所長為安部健夫、貝塚茂樹、塚本善隆、桑原武夫。圖書目錄之負責人為倉田淳之助。（註七）

以上三處，都是半世紀以來，日本從中國蒐羅去的書。至於固有的善本書，看森立之“經訪古志”，島田翰“古文舊書考”，（註八）長澤規矩也“日本書誌學史”“足利學校秘本書目”（長澤規矩也、川瀨一馬編，同校遺蹟圖書館鉛印本）“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宮內省圖書寮編，1930年鉛印本）“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籍目錄”（內閣書記官室記錄課稿，1914年鉛印本）“佚存書目”（神田喜一郎、長澤規矩也編，1933年東京文求堂鉛印本）“關東現存宋元版書目”（長澤規矩也編，1938年東京日本書誌學會鉛印本）等書，可以知道個大概。日本國立大學設一個講座，就附有固定的圖書研究費，教授盡其能力，蒐羅研究資料，到退休圖書全部為學校所有。代代相傳，凡是有悠久歷史的學校，研究室的書都是充棟塞窗，幾乎無容身之地。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尤其是洋洋大觀。繼任的講座完全可以憑藉前人的業績前進。私立的學校也極注意典籍，僻處奈良的天理教大學圖書館有八十萬冊書，其“和漢稀書目錄”，極多珍秘。京都佛教徒的龍谷大學印有“龍谷大學圖書館善本目錄”（1936年龍谷大學出版部鉛印本），也可注意。

日本所藏我國古代文物，見於奈良東大寺正倉院，及奈良京都東京博物館的，知道的人很多，記述的也不少。私人的蒐藏，同樣大有可觀。原四大財閥之一，住友友純男爵，多年來專收彝器鏡鑑，築“泉屋博古館”於京都東山下。一九一九年印出「泉屋清賞」（大塚巧藝社印），內容為中土彝器鏡鑑圖錄，由瀧精一、內藤湖南兩教授為之鑑定，濱田耕作釋彝器，原田淑人釋鏡鑑。摸印之精，駕“西清古鑑”而上之。一九二六年印出“泉屋清賞續編”彝器部（國華社印）內藤虎次郎為作漢文序，濱田耕作考釋。十鐘山房主人澠縣陳介祺（簠齋）所藏的十鐘，也歸於住友。印有“陳氏舊藏十鐘”為泉屋清賞的別集一冊，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九月印，濱田耕作為作考釋，先鐘總說，次十鐘各解，十鐘順序及名稱，均據簠齋藏器目。一九三四年印有“刪訂泉屋清賞”，梅原末治博士為作解說。這都是戰前的書。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印出“泉屋清賞新收編”（京都住友家自印本）仍由梅原末治為編訂，可見他的收藏正繼續發展。梅原所編尚有“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六冊）“支那古玉圖錄”（1955刊），上野有竹印有“有竹齋藏古玉譜”（1925年東京寫真工藝影印）附有濱田耕作的中國古玉概況，及羅振玉序。這些古玉全部是羅振玉的舊藏。一九六四年福岡人高島菊次郎印出有“槐安居樂事”，收我國名畫法書三百餘種，由杉村勇造為作解說。高島代表三井會社，住南京很久，全部書畫得自中國。京都有藤井氏“有隣館”，也是私人的中國文物博物館。日本的收藏

家，多喜歡和學術界合作，把他們的寶藏，無條件貢獻為學術研究資料，也算難能可貴了。

三、研究風氣與方法

日本的漢學者，從古多世代相傳。從朝鮮去的，王仁的子孫，稱為東文，王辰爾的子孫，稱為西文，“家傳文雅之業，族掌西庠之職”。以後菅原、大江兩家，專講紀傳，中原、清原兩家，專講外記。到了德川時代，林道春的子孫，輩輩作幕府儒官，講程朱的理學，傳唐宋的古文，跟德川氏相終始。到現在這種傳統還存在。例如在九州大學講宋明理學的楠本正繼（1897—1963），稱為當代日本講宋明思想的第一人，著有“宋明時代儒學思想研究”（1962年11月廣池學園出版），他的祖父端山就是平戶藩儒，篤信程朱，著有“學習錄”，“匪躬賡義”等書，叔祖碩水，是“日本道學淵源錄”的作者。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的教授賴惟勤，是有名的漢文“日本外史”作者賴山陽（註九）的後人。故東京大學鹽谷溫教授（1878—1962），伯祖世弘，祖父簀山，父時敏都曾任儒官，有漢學著作，他的兒子鹽谷桓依然在昭和女子大學教漢文。宇野哲人，和他的兒子精一，先後任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科主任教授。東大高田眞治博士，和他的兒子高田淳（學習院教諭）都治中國思想史。京都大學中國地理沿革大家故小川琢治教授二子，貝塚茂樹治中國考古學，小川環樹治中國文學，都是現任京大的名教授。版本目錄大家前京大教授神田喜一郎博士的兒子神田信夫，現任明治大學東洋史教授，正研究滿文老檔，到臺灣來過。早稻田大學實藤惠秀教授，和他的兒子實藤遠（學習院教諭）都研究中國文學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大學竹田復教授的兒子竹田晃，也以漢學世其家。東京教育大學名譽教授諸橋轍次博士，把衣鉢傳給他的女婿內野熊一郎教授，青木正兒博士也有一個兒子治東洋史。這種風氣很像我國古代孔氏的傳經，班門的著史，也像清朝高郵王氏、嘉定錢氏、儀徵寶應二劉氏的世代治經史專門之業。

日本的漢學者重視專業和分工。治文學史的很少談哲學，治思想史的也絕少談文學，治宗教史的也更少談宗教以外的事。一確定了研究範圍，常常延續數十年，到死不變。例如宇野哲人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印行“東洋哲學史大綱”（國學院大學出版部），時年三十六，一九五四年印行“中國哲學史——近世儒學”，時年七十九，中間四十多年裏，有三十來種專書出版，始終不離這個研究範圍。（註十）又如到臺灣大學考古系講過學的梅原末治，一九二五年發表“鑑鏡之研究”，時年二十六，一九二七年有“銅鐸之研究”，一九三一年有“漢三國六朝紀年鏡集錄”，“歐美之中國古鏡”一九三三年有“歐美蒐儲中國古銅精華”，一九三六年有“漢以前古鏡之研究”，“戰國式銅器之研究”，一九四〇年有“古銅器形態之考古學的研究”，一九六二年有“中國古銅器觀目錄”，一九六三年有“日本蒐儲中國古銅精華”，也是三十八年如一日，鈴木虎雄活了八十五，鹽谷溫活了八十三，研究的範圍，始終是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津田左右吉活了八十八，研究的範圍，主要是日本和中國思想史。長澤規矩也，年已六十六，著作論文不出書誌學（目錄版本）疇範。這和我國的學者如章太炎、王國維、梁任公、胡適之先生等的範圍大，變化多，以通天地人為儒，五花八門，精力分散，斐然成章，有始無終，是頗不相同的。

選生僻的小題目，作長時期狹而深的研討，寫綽密周詳的大書，闡明蒙昧的史蹟，也成為一種風氣。如故東京大學加藤繁教授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925年東洋文庫論叢六）淵博縝密，兩本書現在舊書店標價到日幣三萬九千元，因為一般學術界到現在看作博士論文

專題研究的模範。如故關野貞博士的“中國碑碣形式的變遷”(1935年刊),如足立喜六的“考證法顯傳”(1940年東京法藏館刊),如佐伯好郎的“中國景教碑文及遺物之研究”(1916年刊),都可以說是極小的題目。如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遺”(1933年3月東方文化學院刊),如松本榮一的“敦煌畫之研究”(1937年3月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刊),也可以說是生僻問題,如杉木直治郎博士的“阿倍仲麻呂傳研究”(一名朝衡傳考,1940年東京育芳社刊),如小松原濤的“陳元贊之研究”(1962年7月東京雄山閣版)都是小題大作的好例。朝衡是日本的留唐學生,在唐朝作到秘書監、鎮南都護,終老於唐,中國書日本書記他的事情資料都很少,杉本氏(廣島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連絡委員)鉤稽蒐羅,以多年的努力,寫成了幾十萬字的考訂,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深思玄解,化不可能為可能。(註十一)陳元贊是明末渡日的一個華僑,對日本文化頗有貢獻,可是梁任公留日多年,對此人全無所知,日本也從無詳審傳記,供職靜嘉堂文庫的小松原氏,却作出了三百六十多頁的大書,從此這個人的事蹟彰彰在人耳目了。(註十二)普通專門學者不寫他專攻以外的書和文章,為大學生寫概論入門的書,為一般社會寫通俗讀物是極流行的風氣。以通俗的書吃飯,以專門的書對文化作交代。大書店選擇作者,不分別書的性質,斤斤計較銷路。例如岩波書店印了“新唐詩選”,“水滸傳譯本”“中國詩人選集”等大量賺錢的書,也可以印津田左右吉全集等服務的書了。中央公論社為吉川幸次郎印“知非集”(漢詩文集1960年刊),弘文堂為鈴木虎雄印“豹軒退休集”(1956年刊),也是這種性質了。

日人過去利用在東北的特殊政治地位,作了一部分考古學的發掘,整理所得資料,編成書的有“貔子窩”(南滿洲碧流河畔的先史時代遺蹟,原田淑人、濱田耕作著,1929年刊)、“牧羊城”(南滿洲老鐵山麓漢及漢以前遺蹟,原田淑人、駒井和愛著,1931年刊)、“南山裏”(南滿洲老鐵山麓之漢代軛墳,島田貞彥、濱田耕作著,1933年刊)、“營城子”(牧城驛附近之漢代壁畫軛墓,濱田耕作、水野精一說明,1934年刊)、“東京城”(1939年刊)、“赤峰紅山後”(1936年刊),這是所謂東方考古學叢刊六冊。地上史蹟的調查研究,他們作的範圍更大。常盤大定關野貞合編有“中國佛教史蹟”(1925—1928年東京佛教史蹟研究會印)“中國文化史蹟”(全十二輯1939—1940東京法藏館刊)常盤氏自1960年起,八次訪華,考察歷史上文化上重要遺蹟遺物,收圖版一千三百餘,附加各種說明。關野貞、竹島卓一合著有“熱河”(1934年12月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印),小柳司氣太編有“白雲觀志”(1934年東方文化研究院東京研究所印)。白雲觀自元初以來,為道教全真派大本山,本書為最詳審之調查說明。小柳司氏於一九三一年訪問該觀十七次,蒐求各種資料,始得成書。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兩教授編有“響堂山石窟”(1937年印)“龍門石窟研究”(1941年印)“雲岡石窟”(由1950至1956年共出十六卷)日比野丈夫、小野勝年合著有“五臺山”(1942刊)石橋丑雄著有“天壇”(1957年山本書店印),這些書都是歷史考古,文化藝術研究的混合物。研究人類學的鳥居龍藏,一九〇二年深入西南各省,考查苗民生活,著有“苗族調查報告”,又屢次旅行滿洲蒙古,作“人類學上所見之東北亞洲”。明治大學教授,曾在中國文化學院講學,作“遼制之研究”的島田政郎博士自稱曾十二次旅行大陸。日本學者把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並重,在蒐求研究資料上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至的。

工具書如目錄、辭典、索引等,可以代表一個國家學術的水準和活躍動態。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實在很努力。諸橋轍次的“大漢和辭典”(十三冊,1960年出齊,東京大修館版),池

內宏、橋本增吉等所監修的“東洋歷史大辭典”(八冊1937年東京平凡社出版),近藤奎所編的“中國學藝大辭彙”(1939年刊)龍谷大學所編的“佛教大辭典”(六冊1935年富山房版),山田孝道所編的“禪宗辭典”(1943年版),中國語學會所編的“中國語學事典”(倉石武四郎等編,一九五七年江南院書版,六冊)。橋川時雄所編的“中國文化界名人圖鑑”(1940年大谷仁兵衛發行),外務省編的“現代東亞人名鑑”(1950年版),對於一般研究中國學術的很有用。國立北平圖書館於民國十七八年間,始設編纂部索引組,印行國學文學論文索引。民國二十一年洪業作“引得說”,燕京大學圖書館得哈佛燕京社資助,大編各種漢籍引得。民國二十三年開明書店印出“十三經索引”。日本學者聞風興起,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先後出有“國語索引”(1934刊)、“遼史索引”(1936刊)“冊府元龜索引”(1937年)、“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多冊,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佐伯富等編有“資治通鑑索引”(1961年刊)、“中國隨筆雜著索引”(1954年刊)、“宋史職官志索引”(1963年刊),廣島大學斯波六郎編有“文選索引”四冊(1933—34刊)近年東京東方學研究日本委員會,並且重印了燕大所編的引得一部分。連巴黎大學北平漢學研究所編的漢籍通檢許多種,流傳到日本各圖書館的也不少。京都大學平岡武夫教授所編的“唐代研究指南”(七書 1. 唐曆 2. 行政地理, 3. 散文作家, 4. 詩人 5. 長安洛陽索引編 6. 資料編, 7. 地圖編),更爲研究唐代文化的高級工具書。國會圖書館編有“戰後五年中國關係圖書目錄”(1950)。賣中國書的書店所出的目錄,如東京的山本書店書目、聖堂書籍文物流通會目錄,大安書店的“大安”,京都彙文堂的“冊府”,也都知道運用學術分類的常識,著錄詳而翻檢便,可比當年北平琉璃廠書店的博雅老板。

日本的學者是以譯書的勤與快著名的,中國書漢學者因爲可以加上訓點讀,所以不需要全譯日文。但是爲了一般讀者方便,爲了深切理解,中國書的翻譯也盛行。據早稻田大學實藤惠秀教授所作“日本譯中國書錄”(1956年5月印),從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到一九五四年,三十七年裏,日本譯出了一千零二十種中國書,平均每年要有二十七本書出版。昭和十五年(1940)一年就有一百六十二種書出版。這些書自然以新書居多。可是近年可以看見日譯明史食貨志(和田清譯1957刊)日譯二十二史札記(續國譯漢文大成本,1944版),日譯“中國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尚秉和原著,秋田成明譯,1943刊)日譯蒙古源流(江實譯1940刊)日譯長春真人西遊記(岩村忍譯,1948刊)。日人是不避免重譯的,論語、老子等書不知道有多少種譯本在同時流行。最近五年內出版的論語通俗書在十種以上。水滸傳在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有岡島冠山的譯本刊行,現在流行的有佐藤春夫的譯本,吉川幸次郎的譯本(岩波書店)竹枝茂夫的譯本(平凡社版),吉川英治的譯本(講談社版),百花齊放,各有需要。

歐美人研究中國學術的書,國人不甚注意,日人却譯出了不少。舉其較重要值得注意的,耶穌會士法國白進(J.Bouvet 1656—1707)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所作的“康熙大帝傳”有後藤末雄博士1941年譯本。德人夏德(F.Hirth 1845—1927,胡適之博士考試委員之一)用英文所著的“中國古代史”(1908年初版)有山口高商教授西山榮九譯本(1918年初版,卷首有張繼漢文序),法國葛蘭言(M.Granet 1884—)一九二〇年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有內田智雄譯本(1938年東京宏文堂版)德國柏林大學名教授福蘭克(Otto Franke 1863—1946)所著“中華大歷史”(1930—37版)有高山洋吉譯本(1938年東學社版三冊),美國芝加哥大學顧立雅教授(H. G Creel)所著“孔子與其傳說”有田島道治譯本(1961版),英

國衛利教授 (Arther Waley 1889—) 一九四九年所著的“白樂天傳”有花房英樹教授譯本 (1959年東京みすず書房版), 瑞典高本漢所著“中國語言概論,” 有岩村忍教授等譯本 (1940版)。關西大學的石濱純太郎, 京都的神田喜一郎, 都是極注意歐美人的漢學的。石田幹之助教授有“歐人之中國研究” (1932共立社出版) “在歐美的中國研究” (1942年東京創元社刊) 兩書, 總述歐美人研究中國學術的歷史, 高瞻遠矚, 正確扼要。他的書以東洋文庫的豐富收藏為憑藉, 因為他就是按洽買莫利遜書的人, 曾在文庫任職十多年。後藤末雄博士、青木富太郎也有這一方面的著書。看以上所學的譯書, 可見他們注意範圍的廣泛, 選擇的精當。

日本漢學界幾乎全國成一個有機體活動。全國性的學會, 地域性的學會, 一個學校的學會, 名目繁多。學會的活動, 編書, 出刊物, 講演討論, 定期會讀, 應有盡有。“日本中國學報”是全國性的刊物, 年出一冊, 由重要的大學輪流編, 除了登論文外, 記一年一度的全國年會詳細報導, 論文發表要點, 學界展望, 分別就經學, 思想, 文學, 語文三大類, 按國別, 時代編, 重要新書及論文目錄, 並作概括評介, 執筆者包括許多學校的人。文部省分配的學術研究費, 是把許多學校研究類似题目的合為一組, 共同核定, 分擔工作。例如昭和三十八 (1963) 年度, 有一個題目是“朱子的總合研究”, 費用一百萬元, 代表者宇野精一 (東京大學), 參與的人包含七個大學, 十三個教師, 大題目有十個, 作綜合的有三人。一個題目是“江戶時代京都大阪的漢學研究”, 費用一〇五萬元, 代表者石濱純太郎 (關西大學), 參與的有十五人, 五個大學。我參加過一九六四年五月的東方學會年會, 在東京法政大學開會, 到七十多人, 宇野哲人主席, 外務省招待。發表論文的中美法德日人都有, 出席的有十四國的學人。同月京都大谷大學開全國性的佛教學術大會, 發表論文的凡二百五十人, 約三分之一的題目與中國有關。在日本公立學校, 教授退休早 (東京大學為六十歲, 京都大學為六十三歲) 國立大學退休的名教授, 多半到私立學大學任課。又有把一個科目集中時間講的辦法, 所以距離很遠的大學, 例如京都和東京, 還是可以互相兼任。這使全國學術界的風氣可以溝通, 資料容易交換, 同行互相觀摩討論的機會增加。公私立圖書館目錄完備, 攝影方便, 找資料也省許多事。印刷業發達, 出書容易, 書店成了許多學人合作的動力和樞紐, 名實相配, 忘年和鳴。社會上不同程度, 不同需要的人, 各自得到他所希望的讀物。

四、重要成就與代表書刊

日本學者研究我國學術, 用力最多的是在滿蒙史地, 邊疆國際關係, 其次是宗教史美術建築史方面, 其次是法制經濟社會史方面, 再其次才是哲學文學, 語言文字。滿蒙史地研究過去是配合他的大陸發展國策, 由滿鐵株式會社以大量資金協助, (註十四) 政談與學術混化, 諜報與考古交流。從純學術觀點看, 有許多書是要歸淘汰的。在宗教美術建築音樂史方面, 他們却有不少成就, 蒐集資料勤, 觀點新, 比較史料多, 師徒相承, 步步前進。如塚本善隆的“日華佛教交涉史研究” (1944年弘文堂刊) “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 (1942年弘文堂刊), “唐中期之淨土教”等書, 比常盤大定、辻善之助時代, 綽密深入多了。阿部肇一的“中國禪學史研究” (1963年誠信書房), 徹田茂雄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 (1965年東京大學出版會) 木村英一的“慧遠研究” (1960年創文社版) 以及佐伯好郎的“景教之研究” (1935東方文化學院版), 都是在中國不容易找到的書。東京大學仁井田陞博士著中國法制史研究 (四冊 1. 法與習慣道德 2. 刑法 3. 土地法 4. 家族村落法, 東京大學出版會版), 周藤吉之著有“唐

宋社會經濟史研究”“宋代經濟史研究”“中國土地制度研究”(均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被推為這方面的名著。在哲文方面,從中國讀者看,近年所出,值得介紹的書,有故九州大學教授楠本正繼所著“宋明儒學思想研究”(1962年千葉廣池學園出版),山形大學教授八木澤元所著“明代劇作家研究”(1959年東京講談社版),京都大學教授吉川幸次郎所著“元雜劇研究”(1948年岩波書店版,已有鄭清茂中譯本,民國四十九年藝文印書館版),東京大學教授藤堂明保所著“漢字語原研究”(1963年學燈社出版)。對於漢籍版本目錄,造詣最深的是京都的神田喜一郎博士,和東京法政大學教授長澤規矩也。神田的祖父香巖是有名的漢詩人,長於書畫鑑賞,收藏不少典籍,和島田翰、董康等交遊。喜一郎曾任職宮內省圖書寮,京都博物館長,先後執教於大谷大學、台北帝大、京都大學、大阪大學,遊學英法荷蘭,多見祕籍善本。民國初年他所寫“論四部叢刊之選擇底本”就為葉德輝所首肯,錄入“書林餘話”,著有“東洋學說林”(1949弘文堂刊)“典籍劄記”(1948高桐書院),“敦煌學五十年”(1960東京二玄社刊)等書。長澤為神奈川人(1902—)著“書林清話糾謬並補遺”“中華民書林一瞥”(1931東京研究會刊),知名於我國。其他所著書有“書誌學論考”(1937東京關書院刊),“中國書籍解題”(1940東京文求堂刊)“和漢書之印刷與歷史”(1956京都吉川弘文館版)等書。他所考索的日本漢籍流傳翻刻歷史,對於我們非常有用。漢學雖然流行,能寫作標準漢詩文的人却逐年減少了。曾得日本藝術院獎的漢詩人元老服部擔風,於1964年去世,壽九十六。(註十五)“君山詩”“君山文”的作者狩野直喜博士,1947年作古,壽八十。印有“豹軒退休集”的新瀨人鈴木虎雄教授,於出書後七年(1963)壽終,年八十五。今之工漢詩文者,殆以吉川幸次郎博士為首選,印有“知非集”(1960中央公論社版)散文淵雅典麗,有物有序,詩亦清切富感興。東京大學的高田真治博士,岡山大學的木下彪教授,均能詩,並且熱心於漢詩的傳授。(註十六)漢詩文的寫作雖然走下坡,中國語言的教學研究,却有長足進步。東京有中國語研究會,前東大教授倉石武四郎任會長,合編“中國語學事典”,動員有七十多人。其中國語研究史一冊,中日歐美蘇聯,研究華語之歷程文獻,羅列無遺,殊為難得。倉石所編的“岩波中國語辭典”(1963年9月版),採用了羅馬字記音。不少漢學者的華語能力,遠過於他們的前輩。華語學習仍以北平語為主,惟奈良天理大學有粵語講座。東京廣播電臺的華語講座,許久由東洋大學的魚返善雄博士主持。他是語言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也有很深造詣,不僅以純正清麗的北平話擅長。研究中國學術之定期刊物,較重要者如下“

“日本中國學會報”,創刊於1949年,年出一期,通訊處為東京湯島聖堂,已出十九集。

“東方學”,東京東方學會發行,理事長宇野哲人,已出三十輯。期刊曰“*Asiatica*”刊英文史學論文,已印至第八冊。

“東方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印,1931年創刊,已出三十餘冊。

“東洋學報”,東京東洋學術協會編,創刊於1911年(清宣統三年),由白島庫吉、池內宏,和田清、榎一雄等先後主持,延續五十餘年,通訊處在東京富士前町東洋文庫內。事實上為東京大學東洋史系及東方文庫人員之發表刊物。

“中國文學報”,京都大學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室編印,由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主編,已出二十餘冊。

“東洋史研究”,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主編,1935年創刊,現代表人為宮崎市定教授。

此外東京斯文會出版有“斯文”,1919(民國9年)創刊,為提倡儒學尊孔,推廣漢文教

育之通俗刊物，由宇野哲人、鹽谷溫、高田眞治、加藤常賢、內田泉之助等先後主持，通訊處爲湯島聖堂，現編輯人爲原三七，已出至四十餘期。東京教育大學出有“漢文學會會報”“漢魏文化”內野熊一郎主持。早稻田大學出有“漢文學研究”，“東洋文學研究”（實藤惠秀主持）廣島大學出有“中國中世文學研究”（小尾郊一主持），日本大學出有“漢學研究”（竹田復主持），也各有可取的地方。

五、結 語

日本從隋唐時代，直接輸入中國文化以後，歷宋元明清，凡是中國主要的學術文化，技藝風俗，或遲或早，沒有不復演出現於扶桑三島的，所以日本文化學術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學術的延長。在德川末期，日本國學者和漢學者的軋轢，從遠處看，深處看，不過是一種意氣門戶之爭。明治維新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日本的漢學者，事實上接受了歐洲人的觀點方法來整理中國資料。把漢學看作“東方學”的一部分，就十足表示想法作法是從巴黎柏林倫敦來的，所以伯希和、馬伯樂等人的影響，遠大過了住過京都的羅振玉、王國維，僑居東京的章太炎、梁任公。（註十七）這使日本的漢學面目革新了，也變質了。漢學的變質，也使日本的國學變質，學問和人生的關係，日漸分離。從幕末到明治初年的文人國士風度，不再存在，學人或以模稜兩可自全，或以介紹黃色書刊，諱世取寵，勤勤懇懇，排比資料，摸挲古董，却缺乏研究的理想和目標。戰後有些學人完全迷失了東方文化的自信。從否定中國文化，演變成否定自己全部文化的氣氛，這真是最可憂的事了。

中國文化對日本有多少貢獻呢？大化維新吸收隋唐文化，使日本形成一個文明統一國家。在蒙古人統一大陸的時候，日本奮起抗拒，得保獨立，在滿洲人佔領禹域的時候，日人以高度的警戒，閉關自保，免於淪爲大清帝國的附庸，漢學的啓示，宋明東渡遺民的鼓舞協助與潛力，是極明瞭的史實。日本的歷史，以吉野（南）朝爲正統，談到中國，對於諸葛孔明、文天祥、朱舜水等人的特殊崇拜，和自衛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明治維新的尊王攘夷，也是儒家思想的顯現。漢學決不僅是單純的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也不僅是典章制度的記述，史蹟史物的踏查發掘。思想上的內聖外王，文學上的淑世淑人，旋乾轉坤的正義感人類責任感，文化責任感才是真精神的所在。日本有新漢學新國學的產生，以配合經濟工商業的復興，才能挽救精神上的真空狀態，解除思想上的民族徬徨。

優越的文化是世界性的，是爲人類所共有的。所以我們對於我國一部分珍貴文物典籍，播遷保存於日本，得到適當的利用研究，不但沒有感傷，反而感到安慰。然而日本所有的中國文物，比起整個大陸所有，不過九牛之一毛，比起臺灣所存，也有精粗整散之別。就甲骨說，全世界所有，約爲十萬片，臺灣所存超過三萬片，日本所有，從寬估計，也不過五千片上下。以住友的泉屋銅器比故宮博物院，以靜嘉堂堂的善本書比國立中央圖書館，那真是河伯比海若，小巫見大巫了。周法高先生寫過一篇“臺灣公藏文獻資料鳥瞰”（註十八），說明臺灣文獻在世界學術上的地位，就是在現在，臺灣的國學者，還是有不少優越條件，研究資料可以力爭上流，爲外國漢學者所無從趕上的。

我們歡迎國際的合作，對日本的漢學者，更有親族兄弟的友情，交換資料，溝通聲氣，研討方法，是彼此有益，對世界文化也大有裨補的。從日本漢學者之多，研究之普及深入，見異不遷，窮約不變，反觀我國人的“日本學”真是不成比例。我們如果承認日本漢文學，是

我國漢文學的延長，日本文化史是中國文化史的外圍發展，所謂“日本國學”就成為“中國學”的一部分。歐美的學者早已懂得這種道理，所以漢和兼治，中國書和日本書一起看待，早已成為風氣。日本的國學者，利用訓讀，幾乎沒有不懂得漢文的。我國的一部分國學者，忽視日本文獻，不注意日文作用，日本書的參考方便，是很可惜的事。談到知己知彼，到現在全國沒有幾個研究日本史日本文學有成就的人，真是非常疏懶，不可思議的事了。

日本漢學者的精勤努力，各種研究的卓越成就，全國性的有機體組織，同一範圍研究者的合作互助，各種資料的公開交流，爭取國際合作的誠意和動力，都可以給我們學術界很多啓示和參考，這是我寫這篇短文的微意。也順便致謝日本學術界友人，在我東遊期間，所給的親切友情，研究考察的方便，無隔閡的意見交換。

- (註 一) 主要據“日本中國學會報”各期所刊國內學會消息。
- (註 二) 出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一日臺北商務印書館發行。
- (註 三) “日本國現在書目錄”，有續群書類從本，古逸叢書本，日本古典保存會影印舊鈔本，日本古典全集所收證注稿本，叢書集成本。日本貞觀十七年（八七五），宮中冷然院火，藏書被焚，因再興改名冷泉院，輯編傳存書目，為日本當時所有之漢籍總目。
- (註 四)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六卷，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民國二十一年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同排印本。
- (註 五) 參看陸心源韻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清光緒八年歸安陸氏十萬卷樓刊本，存齋雜纂之六。又陸著儀顧堂題跋十六卷，續跋十六卷，見潛園總集中，廣百宋齋書目一卷，有排印本。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陸心源條，日本島田翰著“韻宋樓藏書源流考”，有光緒三十三年董康刻本，民國五十年三月臺北世界書局重印本。
- (註 六) 詳見東洋文庫要覽，東洋文庫刊行物目錄。
- (註 七)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概況第七號（一九六五年版）。
- (註 八)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二卷，又補遺二卷，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活字印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二十四卷，明治三十六年（1903）刊，又深縣朱雨重排本。
- (註 九) 賴襄字山陽（1780—1832），以漢文著日本政紀十六卷，日本外史二十二卷，外史起源平，止於德川氏，述日本軍閥之興衰，敘事簡核，筆力勁健，疏宕明暢，縱橫變化，極類華人著作。清光緒五年有上海讀史堂刊本，光緒三年齊學裘玉谿甫序，光緒四年十月錢樸子琴序文，錢氏有評註。清史稿藝文志，誤以為華人著作。
- (註 十) 宇野精一編“宇野哲人博士著作目錄”，見“中國之思想家”（1963年刊）下附錄。
- (註十一) 拙作“唐秘書監晁衡事輯”（見文史叢論中，民國五十年六月東海大學印）係該論文撮要。杉本氏原文初刊廣島文理科大學出版之史學研究第三卷至第七卷，凡十二續，歷時四年半。
- (註十二) 拙作陳元贊評傳，初稿作於民國二十六年春，改訂收入“中國文化東漸研究”（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民國四十五年十月版）中，遠不如小松原氏書之周詳。
- (註十三) 後藤末雄著“支那文化與支那學之起源”（一名中國思想之法國西漸），昭和八年六月版。青木富太郎著“東洋學之成立與其發展”，昭和十五年六月東京螢雪書院版，亞細亞研究篇之一。
- (註十四) 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後藤新平任總裁時，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清光緒三十四年），成立滿洲歷史地理調查部，委託東京帝大教授白鳥庫吉主持，以箭內互、松井等、津田左右吉

稻葉岩吉等任研究員，刊行“滿鮮地理歷史報告”，迄一九三七年中日戰起，共刊十五册。池內宏、和田清等之滿鮮史論文，多刊佈於此。

- (註十五) 服部担風，本名桑之丞，日本愛知縣海部郡人，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以漢詩“担風詩集”得藝術院獎。卒昭和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 (註十六) 斯文會所出“斯文雜誌”，每期登漢詩。湯島聖堂有“聖社詩會”，每月第四星期日下午二時講解漢詩，並練習作詩，由高田眞治博士主持。
- (註十七) 羅、王對於京都大學的元曲研究，古器物甲骨研究，敦煌學研究有啓蒙作用。章太炎、梁任公在東京時代對於日本漢學界殆無影響。太炎書日譯者僅有“國學概論”，係晚年講稿。任公書日譯五種爲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均爲歸國後後期著作。我另有“三家書的日譯”一文，（另一家爲胡適之）刊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臺北中央日報。
- (註十八) 見周法高先生著“漢學論集”（五十三年五月版）。

附記：民國五十三年度，我在學校休假，承蒙亞洲協會資助，三月至六月在日本作了一段極愉快的研究考察旅行，和許多年斷絕了來往的鄰國學術界友人，恢復了連繫。也使我能有機緣看到近幾年續出的漢學界重要書刊。五十四年三月五日，曾應東海大學東風社的請求，講過這個題目。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又應中國文化學院的請求，在陽明山華岡講過一次。因整理講稿爲本篇。本文寫完，想起三年前熱誠招待，爲我所景仰的京都的青木正兒博士，東京的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陞博士，都已作了古人。我的意見已經來不及就正於他們兩位，翹首雲天，真是一大憾事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記。

A SURVEY OF SINOLOGICAL STUDIES IN MODERN JAPAN

Liang Jung-jo

This essay deals first with the various terms for Sinology in Japan, such as "Orientalogy," "Sino-Studies,"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Sinology. The body of this essay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1. *The Situation of Sinological Studies in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ese schola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are still going on with their work. The Chinese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younger scholars in Japan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lder ones, because the latter learned their Chinese in occupied China during the War. In addition, the numbers of universities, the professorships concerned with Chinese Studies, and college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 fields of Chines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have increased greatly. Writings on Sinology are prevalent and popularized.
2. *The Preservation of Sinological Materials in Japan.* There is good preservation of many materials, such as the Chinese books in the Morrison Library, the Segato Librar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in Tokyo,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Studies of Kyoto University, and the bronzes of ancient China preserved in Suitomo Museum and Youlin Museum.
3. *The Spirit and Method of Japanese Sinologists.* Sometimes the work is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and may even be passed on to later generations. The Japanese Sinologists choose a special field and remain within it. Ordinarily they are working in different fields in an organized system.
4.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Sinologists.* Their greatest achievements are in the fields of history of religions, international border relations,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hey also have made a great deal of remarkable progress in philosophy, literature, language, etymology, and the arts. The important works in Sinolog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re listed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ers is made.
5. *Conclusion.* Japanese Sinologists should cooperate with scholars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they should have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world culture. Finally, the autho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cords and books in the field of Sinology preserved in Taiwan.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should be awar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Japa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their research spirit and methods.

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

梁 容 若

本文是作者對日本漢學研究的總合報導觀察。全文分五部分：第一段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漢學研究大勢，第二段敘述日本現在保存的中國圖書文物種類數量，所在地，學術價值。第三段分析觀察日本漢學研究風氣與方法。第四段評論介紹日本漢學重要成就與代表書刊。第五段為結論，從歷史上觀察漢學對日本文化的貢獻，現在研究風氣的得失，日本漢學研究對中國國學者及中國研究日本學者的各種啓示。作者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多年，一九六四年三月至六月三度遊日，在東京大阪奈良京都等地參觀研究，蒐羅大批新出圖書而歸。本文為悠久研究與最近考察所得之總合報導。